

# 共匪的拉丁美洲政策

楊允瑛譯

譯自「亞洲觀察」第四卷第十一期，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出版，作者 Joseph J. Lee

## 共

匪在拉丁美洲主要的目標，是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建立起一個革命運動理論上的領導地位。共匪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要說明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鬥爭與共匪的革命傳統，是相同的。第二，要使拉丁美洲人民相信，共匪革命的經驗與策略，是適合於拉丁美洲的。由於共匪缺乏正常的外交關係，及僅持有有限的經濟實力，所以他們不得不選擇利用一種理論上的手段——藉文化的接觸與交換作爲滲透的工具。

在這些文化關係的發展中，共匪會面對兩個很大的困難。第一，是與一九五六年之前的一段活動有關的，對外而言，共匪捲入了韓戰的漩渦，對內，又要鞏固內部政治與經濟的重建。第二，因爲沒有正常的外交關係，限制了北平對拉丁美洲派遣文化代表團的次數，與所能訪問的國家。爲了補救這種情況，匪酋們機宜地採用了邀請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赴匪區訪問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之間，共匪派遣了二十四個代表團分赴十五個拉丁美洲的國家，但却接待了來自二十一個拉丁美洲國家的二百多個代表團。自從卡斯楚發生政變之後，共匪對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換計劃，變得更加積極。在一九六一——六二年，共匪派遣了五十個重要代表團至拉丁美洲的十八個國家，接待了九十多個來自拉丁美洲的代表團。與共匪有接觸的國家，在一九五六年僅有五個，至一九六二年增加到十五個。斷斷續續地，北平與拉丁美洲的國家作了某些交換訪問，但共匪的主要努力却集中在下列九個國家——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古巴、哥倫比亞、祕魯、烏拉圭與委內瑞拉。

共匪的拉丁美洲政策

## 我

們可以看出，共匪理論上對拉丁美洲的滲透，可分爲兩個時期。首先，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年是擴展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加強促進拉丁美洲與共匪人民間的親密關係，建立起個人間的接觸，設立一些親共匪的組織。例如文化機構與友好協會之類。在這個時期，訪問共匪的個人及代表團，多數均爲學生、藝術家、新聞記者、工會會員、大學教授、律師以及醫生。

對這種文化交流監督與指導責任的機構是僞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於一九五〇年成立。這個機構以及其他機構的活動，直至一九五六年才公然的開始工作，那時，有一個共匪藝術團體，由楚圖南率領，訪問了智利、烏拉圭、巴西以及阿根廷。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在智利，楚圖南曾被智利總統、政府部長以及聖地亞哥市長接見。團員們則受到智利大學生劇團在聖地亞哥市劇場演出的招待。在烏拉圭，楚圖南曾被烏拉圭國會議主席接見，在阿根廷，曾被該國教育部長接見。這一次訪問，使拉丁美洲已存在的友好協會的威望大增，而且亦與一些高等教育機構相接觸，例如智利大學與巴西大學。

幾乎在同時，拉丁美洲的人民開始大批的至匪區訪問。

一九五六年三月，僞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爲三名智利大學的學生主持了一次民間藝術展覽，以及爲一位墨西哥人亦舉辦了一次藝術展覽。緊接的是，哥倫比亞歌舞蹈團，巴西藝術家若伯脫·戴·拉摩尼加（Roberto de Lamonica）與奧克塔比亞·阿倫喬（Octabia Aronjo），以及其他一些拉

丁美洲的作家及新聞記者前赴匪區訪問。例如一九五六年九月，墨西哥的新聞記者安東尼奧·若德利士斯（Antonio Rodriguez）訪問共匪，會與匪外長陳毅會晤。稍後，巴西詩人吉耳·康波斯（Geir Campos）與阿根廷的作家貝納杜·哥頓（Bernardo Kordon）訪問共匪，他亦為匪阿文化協會的祕書長。

### 至

一九五九年，共匪對拉丁美洲的文化接觸方面，有非常大的進展。共匪趁著慶祝偽政權成立十週年紀念的機會，組織了一個哥倫比亞——中共友好協會。於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成立，該協會給予許多人以榮譽主席的頭銜，例如喬治·瑞尼馬（Jorge Zalena），阿爾伯特·蒙帝蘇斯（Alberto Montezuma），天主教神父尤尼圭·皮瑞斯·阿伯拉斯（Purigue Perez Arbelaz），議員比利薩里奧·貝坦考爾（Belisario Betancourt），及教授喬治·比傑內若（Jorge Bejarano）等人。在偽國慶日那天，有來自拉丁美洲十個國家的青年代表團，及來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古巴、墨西哥、祕魯、烏拉圭及委內瑞拉的文化友好協會代表。超過二百人以上的學者、詩人、作家、藝術家及新聞記者出席了由楚圖南舉行的招待會。

一九五九年，共匪對拉丁美洲理論上的滲透，進入了第二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各種不同背景的人，仍為共匪所歡迎，但重點却放在拉丁美洲的輿論製造者，知識份子及新聞記者身上。一九五九年，一羣共匪的新聞記者，訪問了拉丁美洲的智利、烏拉圭、巴西，及古巴，可說是一種非常明顯的新手段。在巴西時，他們訪問了教育部長彼得羅·卡爾蒙（Petro Calmon），討論交換教員的計劃。他們亦拜訪了巴西最著名的「家報紙Ultima Hora」的主任聖木爾·維末爾（Samuel Warner）與副主任保羅·戴·塞爾維拉（Paulo da Silveira）。在烏拉圭，他們提出了交換記者的協定。這次訪問之後，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與哈瓦那出版的一種西班牙文的「中國建設」，開始在拉丁美洲廣泛的流行。

最重要的是，這個訪問團儘力討好拉丁美洲國家的記者們，因此，他們訪問共匪的人數，大量的增加。事實上，拉丁美洲的記者們，出席一九五九年共匪偽國慶紀念會的人數非常之多，共匪不得不分別舉行招待會，來款待

這批超過二百人的拉丁美洲訪問者，由楚圖南接待。

### 共

匪相信，「報紙、新聞社，以及廣播工作的效力，是視其是否為人民喉舌的地位來決定，而非僅靠它的設備」。因此，共匪不惜任何代價去贏得拉丁美洲的報紙及雜誌的支持。無論這些報紙是多麼小，多麼不重要，代表它們的記者們，都可直接到匪區去訪問。在拉丁美洲記者這方面，對匪區多少都抱有一點好奇心，又被共匪對他們特殊的待遇所吸引，於是，渴望着去訪問與報導這個國家。例如，由三人組成的巴西代表團，其中Ultima Hora報的主任及編輯保羅·戴·賽爾維拉（Paulo da Silveira）與奧克塔比亞·馬爾塔（Octavia Marta）與Diarios Associados的記者瑞杜柯·圭馬拉斯（Radoico Guimaraes）於一九六〇年三月訪問匪區。稍後，在同年六月及十一月，又有兩個巴西代表團訪問匪區，後者是由巴西國家新聞記者聯盟的副主席英納西奧·戴·阿蘭達（Inaco de Alender）所率領。

共匪對拉丁美洲的智識份子特別注意。有些教授，亦為國內激進組織的領導人物，例如，盧戴奧杜·奧爾地加（Rudecindo Ortega）即曾任智利教育部長，現為智利激進主義黨的主席。奧古斯丁·阿爾瓦立茲（Agustin Alvarez），為智利社會主義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其他包括墨西哥經濟學家馬斯特·戴·拉平納（Master de la Pena），玻利維亞教授里加度·安拉雅（Ricardo Anaya），厄瓜多爾教授曼尤耳·米迪安（Manuel Median）與阿爾伯多·大衛（Alberto G. Davie）教授，大衛教授是阿根廷里多瑞爾（Litoral）國立大學化工系主任。為數不少的大學校長，亦出現在訪問中共的名單上。他們是巴斯塔杜（Joso Luis Salcedo Pastardo）——委內瑞拉聖瑪麗亞（St. Maria）大學，佛斯康地拉斯（Edmundo Voscondelos）——巴西聖保羅（Sao Paulo）大學，與維拉爾潘度（Abelardo Villalpando）——玻利維亞湯瑪斯·佛瑞斯（Thomas Frias）大學等校長。

### 共

匪理論上對拉丁美洲的滲透，在一九五九年已產生了效果，一九六〇年，則偏重在組織上的加強與發展。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由楚圖南任主席的「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正式成立。此外，尚有七位副主席來協助他。大會有一一六名會員，常務委員會有三十名委員。該協會的目的，據稱，乃在協調十五個對拉丁美洲有關機構的活動。它最終的目的，乃

在「儘力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鬥爭，以及促進友誼，團結，與文化經濟的交流」。同年（一九六〇），在北平舉行了一次超過一百名來自拉丁美洲十五個國家人士的聚會，其中包括新聞界、法界、醫學、商業、及青年活動的代表，宣言主張成立「拉丁美洲——中國友好協會」，相對的，在古巴亦成立了一個「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以協調既存的友誼協會的工作。共匪認為他們對反帝國主義及封建落伍思想的鬥爭經驗，對全部拉丁美洲而言，是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而藉此，亦可增加拉丁美洲國家對共匪的了解。

因此，共匪在一九六〇年對拉丁美洲理論上的滲透運動，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到匪區訪問過的拉丁美洲知識份子，開始將他們的革命運動作得儘量的與共匪相同，而確信中共式的革命，是極適合他們的。他們回到拉丁美洲之後，發表言論，寫了一些文章和書籍，來說明他們的看法。一九六一年，據統計，在墨西哥、巴西、烏拉圭與古巴，即已發行了二十本這種內容的書。共匪自然極願意給予拉丁美洲人民在「國家民主」或「解放」運動的理論與策略上加以協助。

## 按

照共匪的分析，拉丁美洲的國家，雖然發展的程度不同，但在基本上，他們的社會構造，都處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狀態。因為受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所以是半殖民地。「由於經濟的滲透與政治的干預」，美國已經達到了控制這些國家經濟的目的，已建立了一批獨裁政權，將拉丁美洲變成一個供應原料的地方，推銷美國產品的市場，及軍事上的基地。總而言之，依照共匪的看法，美國已使拉丁美洲的經濟，變成了一種典型的殖民地「特殊化的經濟」，極不利於該地區的發展。

北平認為，拉丁美洲國家社會半封建的性質，根源在土地集中於少數大地主手中，即所謂的大地主的領地，而大多數的農民却擁有極少數土地甚至沒有土地。第二個特徵是出現了一批外國來的大地主，尤其是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們」。共匪舉出美國水菓公司為例，它在中美及南美的八個國家中，佔了一千五百萬公頃的土地。

共匪認為，這些大地主，應對拉丁美洲人民的貧困及經濟的落後負起最大的責任。這種土地制度的存在，不僅使社會上的生產力未能加以有效的利

用，亦使農業技術未能達到改良的目的。更有甚者，由於地主只圖私利，對人民漠不關心，使他們的購買力大為減低，限制住了工業產品的國內市場，妨害了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更糟的是，地主對他所擁有的土地，僅將一小部份加以利用，例如在巴西，只有百分之二、六的可耕地被利用，委內瑞拉，只有百分之二被利用。但在這些區域之內，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是沒有自己的土地的。

## 顯

然的，共匪的宣傳着重在，認為拉丁美洲的國家，唯有實行土地改革及廢除地主，才能發展它的經濟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但他們很快又指出，如不首先廢除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則無法實行土地改革。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在墨西哥、瓜地馬拉、玻利維亞，及其他國家，曾不止一次的企圖土地改革，但都終告失敗，其原因乃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阻礙」。布爾喬亞所控制的政府，不敢干涉大地主與帝國主義的利益。共匪認為，拉丁美洲如果想要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則必須具有反殖民與反封建的特性，而且，只有在人民的合作之下，才能完成國家獨立與「人民民主」的運動。

共匪認為，中國在共匪竊據大陸之前，以及現在的拉丁美洲，在性質上都是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因此，共匪的革命，可作為拉丁美洲人民的借鏡。早在一九四九年的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時，共匪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的革命，已為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開拓出了一條道路。劉少奇在亞洲——澳洲工會聯絡會議開會之日，曾發表演說稱：「中國人民擊敗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經過的這條道路，也將是許多殖民與半殖民國家為了民族獨立與人民民主而鬥爭的一條必經之途」。

劉少奇的這篇演說，已經有十五年了，而北平也更相信他們的革命經驗是適合於所有亞非拉丁美洲世界的國家民主運動。共匪的革命方式，將是未曾工業化，殖民與半殖民國家革命的唯一方式，正如同蘇俄的革命方式，是工業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最佳革命方式一樣。

## 許

多拉丁美洲的人民，在訪問了匪區之後，均表示相同的觀念。第十屆偽國慶日時，在北平有一位哥倫比亞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維克多·戴·默契安（Victor d'Almerhan）會說：「哥倫比亞人民，正生活在

個大的社會悲劇之中，與中國人民以前以遭受的極其相似」。更有趣的是，巴西共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長路易斯·卡洛斯·普萊斯特斯（Luís Carlos Prestes）所發表的一段談話：「中國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為在帝國主義自私與壓迫下的所有人民，開拓出了一條民族解放的大道。我們應向中國學習它豐富的經驗，這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要正確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項永恆不變的定則與中國的革命經驗相結合起來」。

普萊斯特斯是由阿厲堅度·艾德羅夫（Alejandro Ithove）所支持的，他是厄瓜多爾共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他說：「中國的革命，告訴了所有仍生活在半殖民與封建情況下的人民，能够，而且一定會獲得他們的解放」。認為共匪的革命經驗適合於拉丁美洲國家的看法，並不僅限於親共匪的共黨領袖們；尙有某些訪問過匪區的遊客，亦表示共匪的革命方式，可供拉丁美洲革命之用。

什麼是「中國的革命方式」呢？依照北平的解釋，即毛澤東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自一九五九年來，毛澤東一再指示，在拉丁美洲，要廣泛地散發小冊子與書籍。儘量的使人認清毛澤東的革命指導與對反帝國主義國家民主革命策略間的關係。例如，在巴西以葡文出版的毛澤東選輯第一卷，指出了共匪的革命經驗，「是那些尙未打破帝國主義枷鎖，而正在尋求解放及進步之途的人民的無價寶源」。在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中國共產黨發展中一個具有歷史性的重要工作，它的特徵在「仔細地分析在農村中的革命鬥爭」，它強調「在對抗右傾機會主義偏差的鬥爭中，農民的角色，是無產階級基本上的聯盟」。

**毛** 澤東對拉丁美洲國家民主運動的指示中，強調兩點——即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線。按照共匪的看法，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其中包括社會上各種的力量在內，以勞工階級與農民為基礎，組織成一個聯盟，由共產黨來領導，這是完成國家民主運動的先決條件。李匪維漢對統一戰線的看法，認為它是「一根魔棒」，中國人民有了它，才獲得了勝利。

爲了要與該定則完全一致，共匪的宣傳家們，又堅持「拉丁美洲的勞工階級，是國家民主革命最基本的推動力量」。這不僅是因為勞工階級有它自己的黨——共產黨，也因為勞工階級與黨，均有豐富的實行革命鬥爭的經驗

。勞工階級與黨的面前，放着兩項工作，共匪認為，要穩固與團結勞工組織，首先可在預定的某一國家中，然後再推廣至全部拉丁美洲，然後再與農民組成密切的聯盟，在這個組織中，居於領導的地位，以鞏固民族統一戰線。區域穩固與合作，就拉丁美洲人民的情況而言，是極難作到的。

這種思想，既非新創，亦非在戰略上完全不可能作到的。左傾區域性的合作，已有某些進展。例如，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卡拉斯（Caracas）舉行的泛美學生會議，及同年十一月在智利的泛美婦女協會。許多知名人士，曾提議組織一個拉丁美洲人民會議，採取亞非會議的形式。從這些情形看來，接着下去的，將是共匪所建議的拉丁美洲勞工階級的團結。一九五九年出席全智利聯合工會時，他們曾堅決主張利用智利全部勞工組織的工會，最後，他們報告在別的區域中，亦有組成勞工聯合的希望。

## 共

匪對拉丁美洲的分析，着重在強調農民是拉丁美洲國家民主運動的主要力量。在這個區域中，農民佔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大多數都不是地主，但可以想像得到，他們都贊成土地改革。共匪鼓勵他們去反抗封建制度與大地主及其支持者——美國帝國主義。最近數年以來，北平認為，拉丁美洲的人民，已漸漸開始注意到他們自己所處的情況，與需要土地改革，這是「拉丁美洲政治鬥爭中的中心問題之一」。在這個鬥爭中，共匪在一九六一年於哈瓦那所舉行的第一屆農場勞工會議中，曾建議工業勞工與其他進步的力量，去協助農民組成他們自己的組織，「採取聯合行動，組成一個更爲堅定的同盟」。

除去工業勞工與農民之間的同盟外，共匪又強調，所有的進步力量，應組成一個廣大的統一戰線。一九六一年在墨西哥所召開的拉丁美洲國家主權、經濟解放與和平大會——該次會議，共匪亦爲贊助人之一——通過了一項決議，承認藝術家及知識份子在一戰線中的地位，鼓勵拉丁美洲的人民向毛澤東學習，因爲成功的國家主義運動，是不可能沒有他們的協助的。

共匪基本上，是不歡迎布爾喬亞參加民族解放的任何統一戰線。他們認爲，布爾喬亞缺乏決心，他們時常關心美國，甚至他們自己亦承認在拉丁美洲與美國對發展公共企業的態度之間，有嚴重的矛盾，必須要反抗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侵入。

## 共

匪的宣傳家們，儘量將拉丁美洲的經濟問題與美國的政策相連接。北平認為，美國的「經濟穩定計劃，在一九五九年，會使阿根廷的工業產品降底了百分之十三。二，畜牧業降底了百分之十一。五」。共匪相信，這種事實，使拉丁美洲的布爾喬亞與美國帝國主義間的衝突更形尖銳化，因而，也更接近「國家民主」運動的偉大潮流。共匪認為，這並不是說，布爾喬亞會因此而形成了堅強的聯盟。在工業不發達的國家，他們的力量是薄弱的。在多數已開發的國家中，他們都希望擺脫美國獨佔資本的控制，因此，可能期望着與勞工階級與其他民主力量相合作，以從事「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鬥爭。由於他們薄弱的階級意識，他們將繼續的作出一些游移不定的行動，在反動集團的壓迫之下，時常自「人民」的立場而轉向「對美國有利」。雖然共匪一直強調要組織成一個統一戰線，其中不僅包括工人、農人、與智識階級，而且亦包括布爾喬亞在內。共匪對一九六〇年在巴西、智利、委內瑞拉、巴拉圭、尼加拉瓜，與多明尼加等國所組成的統一陣線，感到十分滿意。

## 統

一戰線的重要目的之一，即在鼓動人民作合法的鬥爭，例如罷工，學生示威，更重要的目的，乃在為非法行動打好基礎——武力鬥爭。毛澤東會稱「武裝人民反抗武裝的反革命」，在半封建與半殖民的社會中，人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與反動份子」，他們維持了一個最殘酷的獨裁政權。對於這種形式的敵人，人民的革命，不可能採用和平的方式；必定為武裝的鬥爭。共產黨在這種社會裏，不必長期的作合法的鬥爭，或在城市中發動沒有太大希望的起義運動，他們應該在農村開始武裝鬥爭，城市終將被圍困在內。這就是中共革命的經驗。

一九五八年以前，共匪並未考慮到拉丁美洲的人民已可在他們的革命鬥爭中開始武裝鬥爭，但古巴革命的成功，改變了他們的這種思想。在共匪的觀念中，古巴的革命，為拉丁美洲揭開了一個新的革命紀元——一個武裝鬥爭的紀元。一九五九年的初期，共匪對哥倫比亞，玻利維亞與巴西的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以暴力的方式獲得土地，與採用游擊隊的戰鬥方式去反抗獨裁，感到非常滿意。一九六二年，在委內瑞拉的十六省中，已有十一省在進行着游擊隊的活動，在瓜地馬拉、厄瓜多爾、巴拉圭、祕魯、尼加拉

瓜、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阿根廷、墨西哥與智利，亦在進行各種方式與不同程度的武裝衝突。

卡斯楚古巴的出現，北平認為，可由此「證明」共匪分析的正確。共匪認為，七月廿六日成功的基本原因，乃因其遵守了「革命行動的正確路線」，即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線的路線。依照暴動的策略看來，共匪認為古巴革命與中共的革命十分接近。二者都是武裝鬥爭，均以大批民衆及利用農村為基地，以作為革命的基礎。二者均利用鄉村來圍困都市，也都成功地奪取了城市，建立了政權。

## 古

巴的領袖們，對這種分析備加讚揚，以答謝毛澤東的指導。當一九五九年奇·圭瓦拉(Che Guevara)接見一批共匪的記者時，他很明白的表示了他對毛澤東的景仰。會說，「當我們開始游擊戰時，我們曾將毛澤東游擊戰理論加以研究。油印成的毛澤東的著作，在前線廣泛地流通在我們的司令官之間。我們稱它為『來自中國的食糧』。我們仔細的閱讀這本小冊子，從那裏的確學到不少東西。我們發現，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在這本書中，已作了極有系統與科學的研究和解答」。

在這次會晤中，圭瓦拉亦談到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他告訴他的中國客人說：「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總攻擊的失敗經驗，給了七月廿六日革命的領袖們一個很大的教訓。它說明了革命不是僅屬於這一羣人或那一羣人，而它一定是與全古巴的人民有關的」。開始時，領導階層僅由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組成，而這批人在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主義的運動中，又未能完全澄清他們的態度。然後，經過一段時間，漸漸地，他們開始將土地改革與廢除封建制度認為是革命過程中的一部份，這種立場，使統一戰線得以組成，而且獲得農民的支持。事實上共匪非常讚成他們的觀點，由於農民的參加，即可以組成統一戰線，而利用土地改革，則可贏得農民們的支持。

## 共

匪的宣傳家們，亦認為古巴的革命，表示出了「美國帝國主義是可以被擊敗與摧毀的」。如果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認清他們的情況，堅強他們的團結與果斷的戰鬥，他們不僅只能利用「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武裝鬥爭」去推翻「由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與達到國家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亦可「摧毀在革命之後，美國帝國主義所繼續的阻礙與陰謀」。古

巴革命的勝利者，證明了當面拉丁美洲人民的國家民主革命運動時，美國只是一個紙老虎。

政權的建立，並不是革命的結束——那僅僅是一個開始。古巴利用共匪的革命經驗，與毛澤的戰略，奪取了政權，但並未能穩定革命的基礎及實行國家的重建工作。在一九五九年全年的之中，共匪鼓勵古巴人民立即從事改變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實行社會改造。共匪認為，除非古巴能「驅逐美國的獨佔資本，否則要想發展它的獨立經濟，是很困難的，這也是對古巴政治獨立的一種保障」。古巴亦十分同意這看法。例如他們的總統杜爾特可斯(Doricos)在一九六一年共匪工業展覽會在哈瓦那展出時，曾發表演說稱：「變更對生產力量的成長有阻力的經濟與社會構造，是一種歷史性的工作，古巴人民，已自己去完成了這項任務。」

共 匪在一九五九年古巴宣佈土地改革時，曾特予以讚揚。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上，曾評論說，土地改革，是古巴國

家民主革命的基本要素，古巴的頒佈土地改革，對農場制度與外國地主非常的不利。共匪對古巴的土地改革，十分關懷，因為它的成功，對其他拉丁美洲的國家而言，是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的。共匪認為，土地改革一直是「拉丁美洲人民廣大羣衆最迫切要求」。但始終未能實現，基本原因乃在「美國與其他獨裁政權的阻礙」。古巴的例子顯示出，如果他們追隨「國家民主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共匪已獲得的經驗，他們的土地改革，一定會成功的。

簡而言之，共匪現在基本重點放在拉丁美洲，視其為一個孕育革命的地區，也是一個推翻美國在世界上所有力量的鑰匙。在早期，共匪致力於建立起政治滲透的基礎，由擴展「文化關係」進而與政治及勞工領袖，知識份子相連繫，這些人，都列為爭取的對象。古巴革命，對北平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因其與共匪的戰略，有真正的關係——可使毛澤東的公式在拉丁美洲更為推廣，開創了一個革命的新紀元。北平，以有限的資源，企圖以拉丁美洲與非洲作為它世界革命的下一個主要目標。

### 蘇俄為越戰調整駐外使節(續上期)

### 關 素 質

亞 洲 茲列舉亞洲(包括中近東國家)，非洲、歐洲、美洲、澳洲各國俄大使之簡歷，以供研究蘇俄駐世界各國大使之參考：

國 名 及 姓 名	年 齡	教 育 程 度	外 交 資 歷	政 治 地 位	到 任 日 期	專 長
日本大使 W.M.維諾格拉道夫 (Winogradov)	一九二一年生	一九四四年畢業於莫斯科化學學院(曼達里也夫)、一九四八年對外交貿易研究院畢業。	在蘇俄對外交貿易部工作多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任蘇俄對外交貿易部西歐國家貿易總管理局局長。		一九六二年七月任命	對外交貿易專家
印度大使 I.A.貝尼吉克托夫 (Benedictov)	一九〇二年生	一九二七年畢業於齊米梁車夫農學院	一九三七年任國家領導工作，一九五三年開始外交工作	一九三九年俄共中委，蘇俄最高蘇維埃第二、四、五屆代表	一九五三年四月任命。一九五九年任命。	農業專家